

咨爾多譯，為民前鋒：

《前鋒月刊》中的異國文藝譯介與國族想像

陳 碩 文^{*}

摘 要

1930年代前後，隨著左翼文學運動蓬勃發展，民族文藝運動亦因應而生，《前鋒月刊》在上海創刊，是其主要園地，共發行了七期。雖民族文藝之闡發是其主旨，但異國文藝的大篇幅譯介，及世界各國——尤其是弱小民族文藝現狀和發展趨向的介紹，亦佔此類刊物相當之篇幅。本文綜結文化翻譯研究者的觀點，從翻譯與認同、譯者的操縱（manipulate）等理論視角，分析這本刊物中出現的異國文藝翻譯、評介，並且集中梳理民族文藝重要作家黃震遐作品所涉及的國族文化想像與異國情調書寫之間的雙重凝視問題。本文擬考察其編者之世界想像，及其所涉及的異國凝視、國族文化建構與跨文化實踐等議題，以釐清三〇年代的民族文藝運動者如何通過想像「文藝」與「咨爾多譯」，形塑「民族」，達成「異」國理想。

關鍵詞：民族文藝運動、前鋒月刊、黃震遐、異國譯介、國族想像

^{*} 作者現任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Translate, Vanguard!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and National Imagination in *Qianfeng Yuekan*

Chen Shuo-win

Abstract

While proletariat literature and leftist ideas thrived in the early 1930s in China, the movement for nationalist literature, launched by the KMT (Guomindang) government, emerged in response to it. *Qianfeng yuekan* (Vanguard Monthly), a representative journal of this movement, was published by the “Xiandai Publisher” in Shanghai. The periodical made a major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nationalist literature. The authors and funders of this journal are associated with the literary society called “Vanguard”, which existed briefly in the early 1930s, and was well connected to the Shanghai literary circle. While advocating the nationalism of Sun Yatsen in the literary sphere by publishing novels, poems, and plays of th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and movement,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the *Vanguard Monthly* also pai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to finding theoretical justification in foreign literatures. Through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Vanguard Monthl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how the editors and authors of the Monthly interpreted foreign literatures, and formed a concept of national literature by borrowing foreign literature as an inspiration. Moreover, by examining the exotic writing of Huang Zhenxia, the most important Chinese nationalist literature writer,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he editors and writers of the Monthly imagined the new China, by mimicking and modifying “the colonial gaze” of the foreign other. This paper concludes on how the national cultural imagination was interwoven with foreig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elaborates on the complexity of modern Chinese culture and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Keywords: movement for nationalist literature, *Qianfeng yuekan* (Vanguard Monthly), Huang Zhenxia, translation of foreign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imagination.

咨爾多譯，為民前鋒：

《前鋒月刊》中的異國文藝譯介與國族想像^{*}

陳 碩 文

一、前言

中華民國國歌由「三民主義」一句拉開整曲序幕，「三民主義」是「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方針，有賴「咨爾多士、為民前鋒」，以期「夙夜匪懈」地「主義是從」。而三民主義中，尤以「民族主義」為首務。實然，自晚清起，近代中國飽受列強侵略、國勢陵替，亟欲變革，為救亡圖存，民族主義成為知識分子、文人乃至於一般民眾從上到下共同的思緒，不絕如縷地貫串在許多思潮的背後；¹或每每出現在召喚人民凝聚國家意識、團結對外，以與其他國家競存的論述中，成為產生與國家共興亡的國家認同情感之利器。²辛亥革命後，

^{*}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文藝』的『復興』：1930年代上海民族文藝報刊中的世界想像與國族文化論述（NSC 103-2410-H-005-044-）」成果之一，特此致謝。感謝審查委員在論文的審查及修改過程中提出的寶貴建議，筆者獲益良多。本文得以完成，還要感謝鄭文惠教授的鼓勵，以及楊聯芬教授、陳平原教授、夏曉虹教授在我赴北京搜集資料時的支持。另，陳美絲同學、王翌帆同學協尋資料，亦在此一併致上謝忱。

¹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頁4。

²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頁13。

隨著教育發達、西方科學文化在中國的廣泛傳播、報刊傳布、革命思想的發蒙，³民族主義在1920年代後更爲普及。直至中國共產黨成立，馬列思想也在中國逐漸發酵，關於「帝國主義」、「民族主義」的討論，以及中國作爲現代民族國家，其真正的獨立與平等如何可能等關懷，在國共鬥爭日趨激烈後，更成爲左翼陣營與國民黨國族論述熱烈交鋒的空間介面。

一直以來，學界對近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考察，從觀念史、思想史等面向，都已呈現出精彩的研究成果。⁴近年來，班乃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談「民族」的建構時，則稱「民族」實是一「想像的共同體」，而近現代報刊、媒體的傳布更爲此想像的流傳與形塑提供了堅實的基礎。⁵循此，若以安德森的觀點來考察近現代中國的民族思潮與報刊文化間的關聯，我們不禁要問：想像如何可能？其回應又是如何？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追問：「民族主義」在近現代中國如何形塑，如何成爲文藝的指導方針，文藝如何表述此一形象？如何通過定義自我和他者，劃定邊界，形塑出作爲共同體的「我們」

³ 新式教育出現，人民知識的普及，報刊發行與民族主義思潮傳布之關係，尤其是在近現代中國的影響，早已有學者指出，請見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五四前後，傳播新思想的報刊雨後春筍般湧現，與青年對報刊宣傳思想的認識大爲增進有關，請見方曉虹：《中國新聞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37。

⁴ 相關論著如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2002年12月），頁49-120。宏觀的研究請見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收於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226-251；王爾敏：〈清季學會與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成〉，收於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頁209-232；〔日〕小森陽一著，熊文莉譯：〈「文學」和民族主義〉，收於賀照田編：《東亞現代性的曲折和展開》（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33-341。

⁵ 〔美〕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the national “we”)？乃至於成為建立民族國家之國族想像的基石？⁶除學界頗為關注的晚清時期以外，二十世紀的二、三〇年代，尤其是1930年代初期於上海出現的「民族文藝運動」，與其主要園地《前鋒月刊》上的民族主義文藝創作與譯介，以及此刊物與當時文學場域的互動與交鋒，無疑是一個值得進一步考察的案例。

《前鋒月刊》於1930年10月在上海創刊，由朱應鵬（1895-?）及傅彥長（1891-1961）編輯，現代書局發行，共出版了七期左右，此一刊物的撰寫隊伍與參與者，多屬於「前鋒社」的同仁，而「前鋒社」與《前鋒月刊》的出現，與其時左翼文學運動日漸蓬勃，由國民黨陣營主導的民族文藝運動因應而生有密切的聯繫。以往已有相關研究著重探討《前鋒月刊》的創刊歷程及性質，⁷如朱曉進的〈從《前鋒月刊》看前期民族主義運動〉，將之視為展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中心意識的園地。⁸但此一刊物旨在提倡書寫彰顯民族精神的文藝作品，除民族文藝理論之闡發與創作外，異國文藝的譯介，及世界各國

⁶ Michel Billing,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70-74.

⁷ 上述民族文藝人士及其創辦之相關報刊及作品的研究議題，其實並非完全不受前人注意。早在數十年前，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便對誕生在上海的民族主義運動提出相關研究，請見 Nicholas Rowland Clifford, *Shanghai, 1925: Urban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nse of Foreign Privileg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錢振綱的研究爬梳了民族主義文藝社團脈絡，請見錢振綱：〈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社團與報刊考辨〉，《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頁189-200。張大明對三〇年代國民黨文藝思潮之出現、轉折與特色之研究相當完整，資料收集亦很齊全，勾勒出了民族文藝大致的樣貌，請見張大明：《國民黨文藝思潮——三民主義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社，2009年）。倪偉則提出一個觀點：除將這場運動當成一次文學運動來看外，從文化、社會、歷史的動因來評價之，才是抓住了核心，請見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周雲鵬的論文也梳理了民族文藝源流，並對幾個文學個案進行研究，請見周雲鵬：《民族主義文學（1930-1937年）論》（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不過以上研究都沒有對民族主義文藝的異國文藝及翻譯進行全面的探討。

⁸ 朱曉進：〈從《前鋒月刊》看前期民族主義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年第1期，頁290-292。

文藝現狀和發展趨向的介紹，亦佔此類刊物相當大之篇幅；而在此一刊物上發表的民族主義文藝代表作品——如黃震遐（1907-1974）的〈黃人之血〉、〈隴海線上〉，故事背景設在遠地域外，或主角為異國人士，帶有相當之異國情調色彩。這就不禁使我們好奇，以一種同質性之認同——民族——為號召，並以此想像框架作為創作方針的文藝園地，何以會出現大量關注、書寫異國他者的文字？這類譯介實績如何？通過挪用、轉譯異國文本，他們是否可能形塑「有限性」的族群身分，以界定自我？而這反映了刊物編者和作者群什麼樣的思考背景與心態？又產生了什麼效果？以上這些都牽涉到權力與知識生產、一時一地不同文化、不同文學位置間的角力、協商等議題，而目前僅見羅季奧諾夫（Alexey Rodionov）教授針對俄羅斯文學在《前鋒月刊》上的呈現進行討論，⁹其他異國文藝的譯介狀況仍有待細織爬梳。

因此，本文縮結文化翻譯研究者的觀點，從翻譯與認同、譯者的操縱（manipulate）等理論視角，¹⁰分析《前鋒月刊》此刊物中的異國文藝翻譯、評介，與異國情調書寫，並考察其所涉及的異國凝視、國族文化建構與跨文化實踐等議題，以釐清三〇年代的民族文藝運動者如何將翻譯異國文藝作品之譯者或者文藝人士視為可能之志士，彰顯出其將異國文學翻譯之文藝實踐，擬為民族文化的前鋒，以形塑「國族」，達成「異」國理想。此外，本文亦藉助「想像的凝視」（imagined gaze）的觀點，¹¹探討《前鋒月刊》主要作者黃震遐的民族

⁹ [俄] 羅季奧諾夫：〈1930-1931年中國民族主義期刊上的俄羅斯和俄羅斯文學——以《前鋒週報》和《前鋒月刊》為例〉，《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5期，頁114-118。

¹⁰ 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¹¹ 拉岡（Jacques-Marie-Émile Lacan）的鏡像理論指出自我的建立，是通過凝視鏡像，在想像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想像」一詞既指的是映象本身，也是一種誤認狀態。主體對於任何對象的理想化認同，是一種「想像的關係」，既發生在主體內部（intrasubjective），也發生在主體間（intersubjective）。Jacques Lacan, “The Split between the Eye and the Gaze,” i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 Alan Sheridan.

文藝書寫中的異國情懷。本文將會分成三個部分：一、釐清民族文藝運動來龍去脈，以及《前鋒月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二、梳理《前鋒月刊》所刊登的異國文藝譯介種類、特色與其意涵，尤其著重分析民族主義與世界想像之聯繫。三、分析《前鋒月刊》所刊登的異國書寫，尤其是黃震遐的〈黃人之血〉、〈隴海線上〉，考察他的作品如何將西方他者化，凝視自我，塑造新的國族形象。

二、「民族」與「文藝」之概念內涵及「民族文藝」運動始末

民族一詞概念的出現和運用，是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其意涵是在十九世紀與西方思潮交流、及日本和製漢語新詞的傳入等脈絡下成形的。¹² 而民族主義思潮在近現代中國的興起與傳布，爲時已久，更時常被認爲是近現代中國歷史發展、思想推進的動力，甚或結果。¹³ 梁啟超（1873-1929）是晚清中國提及民族主義的先行者之一，1903年，《新民叢報》刊出了他的〈近世歐人之三大主義〉，首先介紹民族主義；1904年，他又陸續完成了〈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新民說〉等文章，指出民族主義是歐洲各國日臻發達的原因，再次強調：「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並且指出民族主義思潮還是一國建立之基礎：「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而面對國勢陵替的今日，「知他人以帝國主義來侵略之可畏，而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國民所當汲

(New York: Norton, 1978), 67-78. Madan Sarup 進一步指出，在此想像的秩序中，一個人對他人的理解是由他自己的意象所塑造的，他人實際上誕生於一種投射。Madan Sarup, *Jacques Laca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86-86.

¹² 黃興濤：〈清末現代「民族」觀念小考〉，《人文雜誌》2011年第4期，頁140-144。

¹³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頁203。

汲者也。」¹⁴更將民族主義視為團結國民、爭取一國之獨立，並抵抗西方帝國的動力。其後，《蘇報》、《民報》陸續刊行，以「種族」為主要概念內涵的「民族主義」隨著革命排滿的思潮開始普及並得到支持，與梁啟超的以文化認同為主要概念內涵的民族主義論述展開激烈對話，從而，「民族」與「種族」觀念的辨析，成為討論晚近中國民族文化與國家認同之重要議題。1924年，孫中山（1866-1925）闡述其三民主義理論，民族主義佔據其中主要的位置，其民族主義論述倡議融合國內各族，要求平等；並期待能排除帝國侵略與國內軍閥割據的現況，要求中國民族的解放，此一思考隨後更成為國民黨陣營的施政綱領，乃至於成為當時國人的主要意識形態。誠然，民國建立後，中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之建設與獨立如何發展及達成此一當務之急，各種關心、思索以上議題的思考或論著，都不能避免地觸及民族的概念內涵。這個現象更可以由北伐完成，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後，民眾對南京政府的期望以及抗戰時期以之為精神號召顯示出來，此非但表明一個統一獨立的現代國家已成為時人認可的目標，¹⁵更表明「民族」一詞之概念與國家認同間已密切聯繫起來，成為二十世紀中國重要的政治術語，¹⁶而此亦即本文所論述的國族想像之國族一詞涉及的

¹⁴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1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頁458。

¹⁵ 中國民族主義一直有著反抗西方強權以及追求國家的統一和國族文化的建構兩個面向，學者多指出，唯有認識後一面向，方能充分理解民族主義思潮何以在近現代中國政治發展上發揮作用。請見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2；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頁151。

¹⁶ 民族文藝在三〇年代出現，也反映了一個民族主義思潮隨中國現代化進程在二、三〇年代復蘇的歷程。包括受新式教育成長的知識階層的出現、印刷出版業的蓬勃、各種啟蒙、科學思潮在社會的廣泛傳布，都為民族主義在1920、1930年代中國的發展提供助力。學者更指出，到了三、四〇年代，尤其是中日戰爭爆發後，此一中華民族的廣泛認同，更成為中國抗日戰爭的精神基礎。請見黃興濤、王峰：〈民國時期「中華民族復興」觀念之歷史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頁129-137。

概念內涵。

實際上，從文藝發展的層面來說，「民族」也是一個在近現代中國不斷被作家文人重申的命題，不論是作爲一種歷史背景、詮釋方式，或者是，形成國族想像的手段。而當論及國族想像與文學書寫之聯繫，識者每每提及晚清的小說界革命，尤其是梁啟超將小說視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之說。梁啟超在其〈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一文中論述大雅君子若不屑道小說，則無疑乃將「一國之主權」操縱之柄授予人也，長此以往，「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因此大力提倡「欲新國，必先新小說」，¹⁷其說影響深遠，世所共知。梁啟超其說標誌著時人將文藝與國族命運聯繫起來思考的精神心態，也揭示了「新文藝」成爲中國現代國族文化想像中重要一環的現象。¹⁸此一國之主權與獨立有賴於以文學的改良、文藝的創發，乃至於文化的革新來完成的思考脈絡，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更成爲思考主流。在中國近現代文學的脈絡中，不論是提倡返古或者創新的各式文學意見，都難以完全擺脫國族想像的身影；而談論「文學」不忘「興國」，更是當時文人或藝術家難以完全迴避的主題。二〇年代，不論是提倡浪漫主義的創造社，亦或是倡導寫實爲尚的小說月報派，關於文學如何隨時進化，或者異國文藝潮流的譯介，如何能促進現代中國文藝的進展，遂成爲其時文人共同的文學關懷。

然「民族」是何時與「文藝」一詞正式連結在一起，成爲「民族文藝」論述的呢？其意涵如何？則要從二、三〇年代之交，隨著當

¹⁷ 梁啟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期（1902年11月），收於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頁884-885。

¹⁸ 民初以來，政治體制變革令人失望，促使人們開始尋找別的途徑以解決困局。學術、文藝於啟迪民智乃一大利器的意見，在新文化運動後，更促進人們追求廣泛概念上的「文化」新生。黃興濤：《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爲視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77-307。

時左右翼陣營的對立日趨白熱化，兩者的文藝路線之爭在中國近現代文壇也開始愈演愈烈說起。1928年，創造社和太陽社陸續提出「革命文學」一說，頗受矚目；普羅文學相關的書籍、報刊也相當熱銷。於是，為回應左翼文藝陣營的挑戰，國民黨內也相應出現了正視「宣傳」、形成文藝政策的意見。此後國民政府開始對出版市場展開一系列的審查，¹⁹並在幾個大報的副刊上——比如上海《民國日報》副刊「青白之園」和「覺悟」，以及南京《中央日報》的副刊「大道」和「青白」——也陸續出現了一些猛烈抨擊普羅文學，宣導三民主義文學的文章，²⁰其時，「民族文藝」論述尚未完全開展。

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後，以「中國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者」為主成立的「前鋒社」亦在上海成軍，發表〈民族文藝宣言〉闡發其主要論述，²¹「民族」與「文藝」於是被聯繫起來，成為文藝指導方針。〈民族文藝宣言〉的核心觀點是「文藝底最高的使命，是發揮他所屬的民族精神和意識。換句話說，文藝的最高意義就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的最高目的「是在形成獨立的民族國家。」由此推論，民族文藝的最終目標也應是「喚起民族意識」，以協助獨立的民族國家成為可能。作者更在文中將埃及、希臘、英、法等國的藝術與文學成就，視為各民族精神意識的表露，最後更以南斯拉夫為例，說明民族主義文藝，在戰後推動了各國之國家發展，向讀者說明民族文

¹⁹ 1929年1月，國民黨通過了〈宣傳品審查條例〉，將「宣傳共產主義及階級鬥爭者」，「宣傳國家主義、無政府主義及其他主義，而攻擊本黨主義、政綱、政策及決議案者」都視為反動，予以查禁、究辦。1929年，國民黨查禁的刊物便有270種，包括文學刊物如《無軌列車》、《幻洲》等。請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5輯第1編「文化」（一），頁214-217。

²⁰ 「青白之園」由上海「青白社」主編，其口號是「在革命路上遍植文藝的鮮花」，辦刊動機為「為革命文學開闢一道新的出路」，參與其中的人士為江浙一帶人士，與黨部的關係密切。

²¹ 〈民族主義文藝運動宣言〉，作者應為「前鋒社」成員，宣言一開始刊登在《前鋒週報》第2、3期（1930.6.29），後來亦載於《前鋒月刊》創刊號（1930.10）。此為民族文藝運動的主要宣言。

藝大大有利於國家社稷。

然他們所認爲的「民族」到底是什麼？〈民族文藝宣言〉文中這麼說：「民族是一種人種的集團。這種人種的集團的形成，決定於文化的，歷史的，體質的及心理的共同點，過去的共同奮鬥，是民族形成的唯一的先決條件；繼續的共同奮鬥，是民族生存進化的唯一個先決條件。」從以上這段話，我們可以看得出來，民族文藝運動者定義的「民族」，具有先天的文化歷史、體質與心理各方面的共同點，如同民族國家（Nation state）論述中的理想國度，此一政治體的認同，乃建立在這一共同點上。²² 然從安德森的觀點來看，「民族」實際上更可能是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強調的是建構民族的文化和政治過程；再加上，中國的組成族群或種族，無疑比其所謂的「一種人種的集團」更爲複雜。且對比民族文藝運動者所討論的「民族」概念與孫中山的民族主義論述，可以發現民族文藝運動者更強調所謂「人種」的一致。²³ 而民族文藝運動者在其宣言中對此異質性的忽略，以及其與「民族」建構之關係的避而不談，恐怕還是與二〇年代後，中國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首要目標爲「建立現代國家」，需要號召一共同的民族認同，以消除種族爭論，於是論述者方將「國家」與一具「種族」性質的民族內涵聯繫起來，強調民族團結與復興，亦與其欲以此保障國家之長治久安有關。除了提出「民族」的定義，考察〈民族文藝宣言〉一文，我們也會發現，反對左翼社會主義思潮，更是其

²² 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指的不只是地理上的單一實體概念，在文化、族群上也是一完整的共同體，但這個理想——即居民來自同一族群，說同一種語言，擁有同一文化和宗教——與實際上各國情形不同。爲解決多族群國家的認同問題，學者指出，國家通過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來構築其基礎，是不可避免的，如此方能創造一種各族群平等的共同文化（common culture）。Philip Spence, Howard Wollman, “Blood and Sacrifice: Politics Versus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in Kevin Joseph Brehony and Naz Rassool, (eds.) *Nationalisms Old and New*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 1989), 103-106.

²³ 孫中山：〈三民主義〉，收於孫中山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9卷〈三民主義〉，頁185-186。

民族文藝論述的主軸。如倪偉研究指出，藉助文藝來奠定民族國家的基石，通過對思想的管制，實現全國的統一和執政的穩定，恐怕還是當時國民政府在上海推動民族文藝運動的首要目的。²⁴亦即，國民黨陣營提出民族文藝的口號，有其政治策略上的考量，其意圖仍著重將「民族」作為當時中國人共同的認同，更是統一的意識形態。

〈民族文藝宣言〉發布後，除了引發左翼文藝陣營對此提出反擊和批評外，提倡文藝應自由開展的文化人士如曾虛白（1895-1994）、胡秋原（1910-2004）等人，也先後對民族文藝論述提出批評。更值得注意的是，從〈民族文藝宣言〉一文中，我們已經可發現民族文藝運動者在說服讀者接受民族文藝是當今主要文藝潮流時，已習於援用異國他者作為範例。也就是說，他們在提倡民族文藝時，其訴求非但是要通過同一的文學創作路線，建構出唯一的國族認同，打造國族的強盛與美好的未來，躋身世界強國之林，最終所要追求的是世界所有受壓迫的民族的解放。這個論述主軸涉及兩個可以進一步思考的面向，其一，其民族文藝理念雖包含著與世界各國並肩的民族復興企圖，但也寄託了世界大同的理想，其中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世界主義想像，此學者所謂中國的民族文藝論述特殊之處；²⁵其二，考察〈民族文藝宣言〉作者之世界論述，雖他們在文中屢以西方各國為例來論證民族強盛與文藝興盛息息相關，但其認同卻絕不偏向西方，也就是說，其中的國族情懷仍然十分強烈。關於前者，此一特殊之處如何在刊物或創作中體現？而後者此一看似矛盾的特質，在刊物中又是什麼面貌？以上也正是本文接著要通過論述民族文藝運動刊物中的世界想像加以釐清的。

²⁴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頁152。

²⁵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頁158。

三、「前鋒社」與《前鋒月刊》

隨著印刷出版業的高速發展、文學社團及其同仁刊物大量出現，二、三〇年代成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黃金時期；1927年前後的上海，更因其相對自由的言論環境，雲集了一批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重要的文化人，提出各式意見和論述，成爲當時中國各式思潮匯集、激盪的中心。其時，左右翼文學陣營間的對話、交鋒也日漸激烈，前鋒社在上海出現，面對著的是此一特殊的文學出版市場與背景，誕生在此一文學陣營已逐漸意識形態化、出版市場蓬勃發展的文化脈絡之下。

「前鋒社」的主其事者爲范爭波（1901-1983）與朱應鵬，亦有一說幕後主導者爲潘公展（1895-1975）。范爭波和朱應鵬都有國民黨背景，政治立場鮮明；²⁶然而，此社團之組成成員並非都是國民黨同志。在其刊物上發表文章的文人，也多有無黨派背景的人士，如傅彥長、陳抱一（1893-1945）、李金髮（1900-1976）。更值得注意的是一群「文學青年」的參與，他們當中有大學生，也有青年軍官，或來自各行各業的知識階層。其實，「前鋒社」從未公布過社員名單，偶也在刊物上刊登招募會員廣告：「投稿三篇以上」者，通過社團確認，即可認作成員（《前鋒週報》第1期），由此可見其希望通過招攬更多社員，擴大影響力，這也是當時許多刊物或社團招徠讀者的辦法。前鋒社的成員組成如此，難怪魯迅（1881-1936）曾以「上海灘上久已沈沈浮浮的流屍」譏之。²⁷

前鋒社的第一份刊物應該是《前鋒週報》。《前鋒週報》創立於1930年6月，是一份十六開的小報，由李錦軒（爲葉秋原之筆名，1907-1948）編輯，上海光明出版部出版。《前鋒週報》只有四版，刊

²⁶ 范爭波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執行委員會委員，又任職上海警備司令部，朱應鵬則是上海市黨部監察委員會委員。

²⁷ 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登其上的作品多為相關宣言及文藝理論的說明，雜文中則多對當時立場相對的普羅文學陣營提出批評。關於資金來源，因《前鋒週報》未付投稿者稿酬，前期多由編者提供稿件，這份刊物是否由國民黨部支持，還有待確認。同年10月，由朱應鵬及傅彥長負責編輯，現代書局發行，版面及篇幅都較長的《前鋒月刊》亦現身上海。前鋒社對兩份刊物的定位，主要以刊登文章的份量長短區分。然經過考察，我們會發現，兩者相較，《前鋒週報》多刊登短篇理論性文字；後者則刊登更多方面的內容，且還多了世界各國民族運動與文藝介紹，而且外國文藝的翻譯與介紹，是《前鋒月刊》比較注重的一個部分。實際上，除了亞美尼亞、猶太等弱小民族的文藝作品外，法國、德國文學作品亦時常出現在此刊物上。

《前鋒月刊》由上海現代書局發行，自1930年10月起，共出七期。《前鋒月刊》的編輯朱應鵬與傅彥長，除朱應鵬同時也是《申報》資深編輯外；傅彥長還是同濟大學的教授，兩人的文藝造詣不低。早在1927年，朱應鵬便在他主編的《申報》「本報增刊」的「藝術界」、「書報介紹」、「青年園地」欄上宣傳類似的民族文藝意見，並刊登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與評介，其文藝理念通過《申報》流傳，影響力也不可小覷。此外，此一融合或效法異國文藝，以建設新興民族文藝，最後達成中華民族的富強和繁榮之文藝翻譯及詮釋觀點，在以上報刊出版前，在傅彥長所主編的《雅典》（1929），及朱應鵬、傅彥長、張若谷（1905-1967）合著的《藝術三家言》（1927）所收錄的文章中，多已可見，²⁸ 以上都可視為此一民族文藝陣營西歐文學翻譯與

²⁸ 在1930年，民族文藝運動正式提出前，傅彥長於1929年便曾創辦一「提倡都市生活的，領導人去享受一切」的《雅典》周刊（上海：卿雲圖書公司，1929年）。傅彥長、朱應鵬、張若谷則又合著《藝術三家言》（上海：良友出版，1927年）一書，發表與民族文藝相關的文章，他們共同的園地還有上海《申報》的「藝術界」副刊，以及他們共同出版稍後的《藝術界》。民族文藝運動中的一些觀點，在上述這些刊物中已經可以零星見到。

介紹之前導。總之，因朱應鵬與傅彥長在上海文化界活動較久，其所主導的《前鋒月刊》，與不少文化人都有往還，因此《前鋒月刊》較《前鋒週報》來說，文藝份量更重，作品實績較多，自然亦較有影響力。

《前鋒月刊》出版後，聲勢一度不錯，加上其他小型文學社團如「草野社」、「時代青年社」以及《當代文藝》陣營在上海的呼應，²⁹ 一時間吸引了不少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參與和注目。然而，《前鋒月刊》出現後，不論是左翼、自由派的文藝人士，都對前鋒社及其文藝活動提出批評，³⁰ 反對聲浪還化為具體行動，發行《前鋒月刊》的現代出版社，不僅遭受巨大的文化界壓力，1931年5月，一些左翼分子攻擊其門市部，現代書局有意停辦此刊。³¹ 接著，隨著參與「前鋒社」的成員逐漸流失，《前鋒月刊》亦告停刊，漸漸地民族文藝運動也就無以為繼，逐漸沒落。

四、《前鋒月刊》中的異國文藝譯介

民族文藝運動的主要關懷，據宣言所示，在於建立中國成爲一個獨立、解放、強大的民族國家，另期待所有受壓迫的民族都能解放，

²⁹ 草野社成立於1929年，參與者多是上海的大學生，出版有《草野週刊》、《草野年刊》等，《前鋒月刊》上常可見得《草野週刊》的廣告，其核心人物也會在「前鋒社」的刊物上發表作品。「時代青年社」與《時代青年》狀況雷同。創刊於1931年的《當代文藝》，由陳穆如主編，作者較有名，比如傅東華、趙景深。以上幾個刊物彼此唱和，一時之間，似乎形成了文壇上一股民族文藝的風氣。

³⁰ 比如曾虛白便曾爲文「要爲純潔的文藝提出嚴重的抗議。」請見虛白：〈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檢討〉《真美善》第7卷第1期（1930年11月），頁1-9。

³¹ 張靜廬在他的回憶錄中說，《前鋒月刊》在現代書局出版，是受到了國民黨的強迫，因抗議事件頻傳，張便有意停刊；經協調後，其遂改發行民族文藝色彩較淡的《現代文學評論》。請見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上海：上海書店再版，1984年），頁140-147。

獲得獨立、平等的地位；而他們以為，一國之文藝，足以喚醒族魂，是達成以上目的之重要手段。不過，他們雖提倡中國民族文藝之再興，但有鑑於文藝作品在十九、二十世紀歐洲民族國家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因此除弱小民族文藝外，尤重刊登德國、法國、義大利等各國的文藝現況評介、論述，以為借鑑，此亦為《前鋒月刊》大部分的內容。

前人研究《前鋒月刊》時，也曾指出異國文學譯介在其中份量可觀一事，稱之相當國際化，然在評述其譯介實績時則指出，《前鋒月刊》所譯介的各國（以德、法為例）民族精神的作家作品，實卻缺乏代表性，體現出該刊編譯者們對各國文藝的不熟悉。³² 因此，《前鋒月刊》上所刊登的這類異國文藝譯介，我們究竟該怎麼解讀？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談翻譯與身分認同的研究中，便曾指出翻譯活動所涉及的文化再現以及身分認同塑造間的關係十分微妙，韋努蒂這麼說：「本土特定文化群體控制著對其它群體的異域文學再現，抬高某些本土文化價值，確立起服務於特定本土利益而必然是片面的異國文本典律。」³³ 「翻譯不僅建構著獨特的異域文化再現，而且因為這些項目是特定的文化群體，他們同時也就參與了本土身分的塑造過程。」³⁴ 他並曾以美國學界對日本文學的翻譯如何影響

³² 比如第1期上所刊登的「代表日耳曼民族藝術的表現主義繪畫」，對於表現主義繪畫如何或者何以最能表達德國的民族藝術精神，該刊編輯並無進一步論述。Alexey Rodionov,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Right-wing Periodicals ‘Qianfeng yuekan’ and ‘Qianfeng zhoubao,’” in EACS Biennial Conference (2010.9). 作者未出版會議論文稿。此先行研究對本文啟發甚多，感謝 Rodionov 教授慷慨賜閱大作。

³³ Lawrence Venuti,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Schäffner, C. and H. Kelly-Holmes (eds.)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 9-25. 中文版請見〔美〕Lawrence Venuti 著，查正賢譯：〈翻譯文化身分的塑造〉，收於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頁328。

³⁴ 〔美〕Lawrence Venuti 著，查正賢譯：〈翻譯文化身分的塑造〉，收於許寶強、袁偉選編：《語言與翻譯的政治》，頁338。

了美國讀者對日本的想像爲例，說明翻譯工作對一地文學形象之影響，及獨特的異地文化的再現，如何反過來參與本地的文化形塑。而另一位研究翻譯的學者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也認爲，翻譯、編輯（editing）都可視爲改寫（adaptation）的一種，而改寫者操縱（manipulate）原文，是爲了使它呼應當下當權者的意見、主流詩學或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翻譯乃是爲了某種目的而作，爲了在譯入語的文化脈絡裡重塑或傳遞某些價值。³⁵ 由此，從上述的觀點考察《前鋒月刊》編譯者的異國文學譯介工作，則重點就不再是探查《前鋒月刊》編輯隊伍是否如實地譯介了異國（民族）的文學文化，而應探討他們選擇再現了什麼作家作品，是爲了抬高什麼文化價值，以及爲了服務何種特定目的，及最終塑造了什麼本土認同？如何聯繫其民族文藝論述？

《前鋒月刊》的編排，通常以幾幅繪畫作品打頭陣，其主要欄目可分爲：各國政經情勢的報導或分析、各國文藝現況介紹、創作、翻譯，以及每期末端必有的「最近的世界文壇消息」一欄，每期大約有兩百多頁，一期售價近兩元。《前鋒月刊》亦刊登廣告，廣告通常爲國貨產品，或者其他與民族文藝運動有聯繫的刊物（《前鋒週報》、《展開月刊》）之促銷說明。

刊登在《前鋒月刊》頁首的繪畫或圖片，多以異國藝術家的作品爲主，七期中，中國藝術家的繪畫或雕塑作品圖片只出現過幾幅。主題方面，除戰爭場面外，《前鋒月刊》刊登最多的便是描繪健壯身體的作品。前者以法國畫家德拉克羅瓦（Eugène Delacroix, 1798-1863）

³⁵ 勒菲弗爾認爲，意識形態（ideology）、贊助者（patronage）和詩學（poetics），是影響翻譯策略的主要因素。所謂的「詩學」，指的是文學觀念、原則或範式；「意識形態」，勒菲弗爾定義爲一特定時期的社會群體所共同接受的觀念或態度框架；而「贊助者」，指的是包括文學系統內部的專業人士，或文學系統的外部因素，從個人、出版商到政黨、國家等對象。總之，譯者的翻譯策略很可能受到上述這些框架的影響。André Lefevere,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2).

的畫，以及西班牙畫家哥雅（Francisco José de Goya，1746-1828）的戰爭畫（第5期）、法國雕刻家呂德（Francois Rude，1784-1855）的從軍之歌作品（第6期），及搭配黃震遐〈黃人之血〉一系列描述匈奴遠征俄羅斯的圖片（第7期）為代表，呈現出《前鋒月刊》編輯對戰爭、民族解放的畫作主題之偏愛。後者除了朱應鵬的畫作〈日車〉、關良的〈浴後〉、李金髮的雕塑圖片〈歡迎〉（第1期）外，與人體有關的作品，還包括了第2期所刊登的「德意志女子訓練」體操圖、第5期刊登的希臘裸體雕刻圖等。然，研究者必會尋思，以戰場或者身體為主題的畫作，為何會屢屢躍上《前鋒月刊》版面呢？要尋找答案，則《前鋒月刊》第2期的朱應鵬〈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一文很具代表性。朱應鵬在此文中指出，在當時的中國文藝界，最需要的便是以民族的奮鬥歷史為主題的畫作；而《前鋒月刊》的編輯者也提出，面對風雨飄搖的國際情勢和消沈的民眾精神，當前中國需要的是刺激的戰爭文學，以戰場為主題的畫作自然符合了民族主義文藝陣營此番期待。³⁶ 此外，希臘提倡體育，男女皆體魄強健，精神進取，是歐洲現今各國強盛的基礎，因此他們亦認為，現在的中國畫壇，應該在審美上提倡和效法這種希臘精神。³⁷ 其實，早在朱應鵬等人於1928年出版的《藝術三家言》中，便大力提倡人體的強壯健美，應作為現今中國繪畫藝術方面的發揮重點，並特別強調所謂的「希臘精神」，因為希臘精神男尚武，女尚美，其繪畫或雕刻作品中強壯的身體形象，象徵了民族（或國體）的復蘇。黃震遐也曾為文論及英雄美人是展現「力與美」的優秀藝術結晶。³⁸ 不過，識者多會指出，自晚清以來，中國思想家便熱衷於提出強壯的身體觀，梁啟超、嚴復（1854-1921），甚至包括魯迅的論述中，皆曾或多或少展現出對

³⁶ 編者：〈關於《隴海線上》與《剎那的革命》〉，《前鋒月刊》第5期（1931年2月），頁2。

³⁷ 朱應鵬：〈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50。

³⁸ 黃震遐：〈積極的藝術思想〉，《申報》藝術界副刊，1929年8月31日。

「新民」身體、文化活力的巨大關注；³⁹ 爾後蔣介石（1887-1975）提出的「新生活運動」，亦企圖將人民身體納入此一「新民」與建構國族的論述脈絡。⁴⁰ 此外，這類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於清潔健康、美麗健壯的想像，更體現出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所謂法西斯式的內在精神。⁴¹ 這個精神，更可以見諸《前鋒月刊》幾期的封面圖，這幾期的封面圖都以圓形、線條、鋸齒構成，如同劉紀蕙的分析，中國二、三〇年代許多刊物中常出現類似風格的構圖，映襯著一種前衛、進步、秩序的美學訴求，反映出當時文壇所瀰漫的衝擊舊有、革新創造的精神，更展現出當時文化人欲通過翻譯異國特殊前衛的視覺圖像，來「翻譯」（表述）其欲開創新局的心態和想像。⁴²

此外，《前鋒月刊》上介紹世界各國情勢的報導文字，可分成兩類，一種是對各地民族獨立或爭取權益的運動有關的報導，如談論印度、安南的獨立運動，美國黑人爭取自由平等議題；另一種則是與軍事、國際關係有關的報導，主題從中日外交、德國海軍等都有，這類文字篇幅不多，在此刊物上，較重要的還是介紹世界各國文藝的專文。在這七期刊物中，印度、日本、美國黑人的文藝報導各出現過兩次，巴黎的畫壇和書店介紹各一次，此外，愛爾蘭、蘇格蘭、西班牙、匈牙利、丹麥文藝現況的報導則各有一次。總的來說，編輯隊伍會選擇報導這些國家或種族，與這些地方各民族爭取獨立自由的歷程有關。如在《前鋒月刊》第2期刊登的易康〈新興民族的文藝運動與

³⁹ 王斑：《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頁45。

⁴⁰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88年6月），頁163-203。

⁴¹ Susan Sontag, "Fascinating Fascism," (1974) in *A Susan Sontag Reade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305-325.

⁴² 劉紀蕙：〈現代化與國家形式：中國進步刊物插圖的視覺矛盾與文化系統翻譯的問題〉，收於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359-393。

文學〉中，作者分別介紹了巴爾幹、波羅的海，共十一個民族追求獨立平等的奮鬥史，並從以上這個角度分析其文學現況。而在以上這些文章的論述中，作者時常表現出一種傾向，即向讀者傳達民族主義是盛行於全世界的；而一國之文壇、藝壇之所以能蓬勃發展，必定是因為他們彰顯了民族文藝的精神。比如在第2期所刊登的〈日本洋畫發展的概況〉一文中，作者陳抱一在介紹日本當今洋畫界蓬勃發展的現況時，便先花了不少篇幅說明日本洋畫界的興盛與日本民族的團結間的關係，最後總結：「在同是東方民族的立場」，日本因團結而藝文得以發展的現況，可以給中國的美術界帶來刺激，⁴³ 便可見其心懷於一斑。在這篇文章之後緊接著登場的〈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一文中，作者便大力強調現今的中國畫家應當將「民族主義」當作中國繪畫的思想，如同德國的表現主義是其繪畫的思想一般，以期產生形式和技巧都很特殊的現代中國繪畫。⁴⁴ 然而，日本洋畫界在二十世紀初期的蓬勃發展，與德國其時的畫壇潮流，情況都遠比《前鋒月刊》的報導複雜得多，《前鋒月刊》編寫隊伍從民族立場對這些國度文藝狀況的評述，雖相對失之簡化，然從翻譯與認同的研究觀點來看，其翻譯的選擇與其翻譯目的息息相關，其目的無疑是爲了向讀者灌輸民族主義思想對於一國文化強盛之助力，以鞏固統治的正當性。因此，他們評介異國文藝時有所偏重、不夠準確，也就不難理解了。

至於每期都有的「最近的世界文壇」一欄，是《前鋒月刊》介紹世界文藝的主要園地，每期刊登六到十則的文壇動態短文，除了諾貝爾獎、法國文學獎金、國際文藝雜誌創刊等世界文壇大事、名作家的新聞消息外，編輯也會在此特別介紹各國寫作民族文學的作家或作品。考察在這個欄目出現的作家中，出場率高的有蕭伯納（George

⁴³ 陳抱一：〈日本洋畫發展的概況〉，《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26。

⁴⁴ 朱應鵬：〈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40。

Bernard Shaw, 1856-1950)、屠格涅夫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1818-1883)、支魏格 (Stephan Zweig, 1881-1942)、易卜生 (Henrik Johan Ibsen, 1828-1906); 此外還有拜倫 (Lord Byron, 1788-1824)、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1788-1860)、鄧南遮 (Gabriele d'Annunzio, 1863-1938)、哈代 (Thomas Hardy, 1840-1928)、克列斯丁洛賽諦 (Christina Rossetti, 1830-1894)、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 1862-1949)、特萊塞 (Theodore Dreiser, 1871-1945) 等。詳察該欄目所報導的國際文壇消息，還是以歐洲各國的動態為主 (詳請見後表); 而其所關注的作家，除以寫作與民族相關的文藝作品出名的外，還是多為已在世界上相當知名的作家。和以上介紹弱小民族追求獨立平等的異國文藝譯介對照，這反映出了《前鋒月刊》編譯隊伍看向世界的兩種眼光，一方面是一股認同、希冀自己能像這些曾經受過壓迫而今重新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傳統的國度，重振屬於自己的民族光輝的眼光; 一方面也是一種欣羨的眼光，將想像中的未來國族文化形象投射在已經世界聞名的，尤其是西歐強國的文藝家身上。也就是說，《前鋒月刊》編譯隊伍對世界文壇情勢、知名作家亦步亦趨的關注，恰恰表現出想參與其中的想像，更有一種我也將迎頭趕上的渴望，充分體現了史書美所說的現代中國知識青年對於「西方」的認同矛盾。⁴⁵

而在翻譯文學方面，七期的《前鋒月刊》上，只刊登翻譯小說，共有兩篇長篇：一篇是李金髮譯法國作家皮耶洛蒂 (Pierre Loti, 1850-1923) 的《北京的末日》 (*Les Derniers Jours de Pékin*)，另一篇是美國斐特 (文中又做裴特，應是美國極地探險家 Richard E. Byrd, Jr., 1888-1957) 少將的《南極歷險記》 (或許是他的 *Little America: Aerial Exploration in the Antarctic, the Flight to the South Pole*)。短篇小說方面，計有陳抱一譯自日本作家和辻折郎 (1889-1960) 的

⁴⁵ Shih Shumei,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36.

〈德漠斯推吶司的沒落〉、汪倜然（1906-1988）譯的亞美尼亞作家阿哈龍尼安（Avetis Aharonian，1866-1948）的〈守夜人〉（第1、2期）、洛生（疑為胡伯懇的筆名，1900-1968）譯自美國猶太作家果爾德（刊物中作 Nschoel Gold，應為誤植，實為 Michael Gold）的小說〈流落的猶太女人〉（第3期）、⁴⁶法國作家莫伯桑（Guy de Maupassant，1850-1893）的小說兩篇：〈米龍老丈〉（*Le Père Milon*，第4期）及李青崖（1886-1969）譯的〈一場決鬥〉（*Un duel*，第7期），美國作家傑克倫敦（Jack London，1876-1916）的作品也登過兩篇，即王宣化（1896-1980）譯的〈無忌〉（第4期）和〈挪！挪！挪！〉（第5期）。此外，還有周伯涵譯的德國作家路易稜（Ludwig Renn，1889-1979，此處刊物誤植其名）的〈戰場〉（第5期）、德國作家克斯登（Hermann Kesten，1900-1996）的〈失去了的動機〉（第7期）、葉靈鳳（1905-1975）譯的保加利亞作家約科夫科（Yordan Yovkov，1880-1937，此處刊物誤植其名）的〈故鄉〉（第5期）、汪倜然譯自美國作家雪帕德（Alfred Tressider，1871-1947）的〈老鼓手〉（第5期），以及譯自哈姆林嘉蘭（Hamlin Garland，1860-1940）的〈漂流的鶴〉（第7期）等等。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翻譯小說的主題通常都與族群故事、民族衝突、戰爭刻畫有關。其中只有《南極歷險記》比較特殊，是以探險故事為藍本寫成的作品。⁴⁷編輯表示，會刊登這篇長篇作品，主要是因為1931年是南極年，歐美強國都在規

⁴⁶ 此處作家果爾德名字應為刊物編譯誤植，查其作品內容、風格，可推斷果爾德應為美國猶太裔小說家 Michael “Mike” Gold (1894-1967)，其作品《沒有錢的猶太人》（*Jews Without Money*）描寫猶太移民家庭於紐約東岸生活，於1930年出版後引起巨大關注。值得注意的是，果爾德在美國咸被認為是一位二十世紀早期的無產文學作家，在國民黨陣營推出的文學刊物上翻譯刊行這樣一位左翼作家的作品，其特殊性不言可喻。這反映了《前鋒月刊》對描寫弱小民族作品的偏愛，更值得深思的是，這無疑更為印證了民族文藝陣營之民族主義想像中所帶有的世界主義色彩。關於其作品之研究，請見 John Pyros, *Mike Gold: Dean of America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New York: Dramatika, 1979).

⁴⁷ 1949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了此書的單行本，一樣由胡仲持翻譯。

劃進一步了解神秘的極地，因此希望國人也能多多關注。然而，這種對擴張、冒險、強國探險、世界旅行的嚮往和興趣，無疑是十八、九世紀以來帝國主義精神的延伸，⁴⁸《前鋒月刊》編輯和作者此類興趣，看似與民族發展關係不大，卻又的確矛盾而微妙地表達出他們想躋身世界強國之林的心態，儘管，民族文藝的宗旨強調其文藝運動中的民族主義絕不是狹隘的國家主義或帝國主義，而是要追求各民族之平等共存。⁴⁹

在其所刊登的翻譯作品中，莫泊桑和傑克倫敦各有兩篇作品受到《前鋒月刊》編譯者的青睞，而他們都是出名的現實主義作家。莫泊桑是十九世紀中的法國現實主義作家，有「短篇小說之王」之稱。莫泊桑自己參與過普法戰爭，其小說以此為背景的不少，比如《前鋒月刊》上所登的兩篇小說，著名的〈米龍老丈〉，描述的是一位法國平凡的農民在人人畏懼敵軍的當兒，卻獨自勇敢手刃敵人，愛國奮鬥的故事；〈一場決鬥〉描述的也是法國國民兵對欺壓他的普魯士軍官復仇的故事，兩篇小說都展現出了法國人民在面臨國家危難時奮勇愛國的精神。至於傑克倫敦，他多被稱為現實主義作家，作品描述底層社會人民的掙扎與生活，其描寫動物的小說更是為他帶來聲譽；但他同時也寫作一些引起爭議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的作品，尤其是〈黃禍〉（“The Yellow Peril”，1904年），及其後出版的幾篇倡導對中國施行種族滅絕的作品。⁵⁰不過，《前鋒月刊》上所刊載的這兩篇傑克倫

⁴⁸ 海權時代來臨後，歐洲人積極運用科學知識與科技發展往各地探險，其地理大發現與帝國擴張之間實具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相關研究成果可見 Daniel R. Headrick,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1. Morag Bell, Robin Alan Butlin, Michael J. Heffernan, *Geography and Imperialism 1820-1940*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一書的討論。

⁴⁹ 潘公展：〈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中央日報》大道副刊，1930年6月26日。

⁵⁰ 傑克倫敦曾於1908年和1910年創作了《中國佬》（*Chinago*）和《空前絕後的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以及其他涉及中國海外移民題材

敦小說，出自他的《南海故事》（*South Sea Tales*，1911年），描寫的是南太平洋索羅門群島的原民部落受到白人的佔領後所受的不平等待遇，及部落人民如何反抗，反映出少數民族爭取平等的精神。從選材來看，看得出來《前鋒月刊》編譯者選擇刊登傑克倫敦作品中主題意識合乎刊物宗旨，即民族文藝宣言中所謂的追求平等、自由的民族主義精神的作品。然而，《前鋒月刊》的編譯者對傑克倫敦的種族主義傾向是否知悉？他們又怎麼看待西方人建構起的「黃禍」論述呢，本文將在下一節通過分析黃震遐的作品加以說明。

另一篇長篇連載小說《北京的末日》（現多譯為《在北京最後的日子》），作者是法國作家皮耶洛蒂，譯者為李金髮。⁵¹ 這部小說共七章，是根據洛蒂的日記彙編而成，描述的是時任海軍上尉的洛蒂於1900年八國聯軍時期兩次出征北京的所見所聞。譯者李金髮是中國著名的現代詩人，曾留學法國，也是知名的藝術家，自1927年開始，李金髮還曾在外交部任職，晚年移居美國，1976年在美去世。⁵² 李金髮的詩歌晦澀、抽象，但也洋溢著異國風情，由他來翻譯以書寫異國情調見長的洛蒂《北京的末日》一書，本身便是一個話題，而比對洛蒂小說原作與李金髮譯本，可以發現李金髮的譯筆堪稱翔實。不過，在探究譯本的忠實程度以外，本文想進一步探討的還是，這部異國作者以外人眼光觀察戰亂中國的翻譯小說出現在《前鋒月刊》的意義。

眾所周知，皮耶洛蒂是一位以書寫異國情調出名的小說家，他最著名的小說是《菊子夫人》（*Madame Chrysanthème*，1887年），以他

的作品。這類作品中涉及的意識形態頗引起爭議。

⁵¹ 參照當時的廣告，此譯本亦曾成書出版，名為李金髮：《北京最後的勾留》（上海：現代書局，出版年不詳），然此書不傳，目前未能覓得此版本。請見錢林森：〈皮埃爾·綠蒂和他的《在北京最後的日子》〉，《中華讀書報》第19版，2007年5月9日。

⁵² 李金髮著，陳厚誠編：《李金髮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

在長崎的經歷為靈感創作而成，深受西方讀者歡迎，很早便被譯介進入中國文壇。⁵³ 在《北京的末日》這部小說中，洛蒂亦用冷靜、細膩的筆調描述了戰亂、凋零中的中國，一個法國人眼中曾經神秘美麗的遙遠國度。洛蒂一方面既書寫戰亂、屍首與流離失所的末日王朝與其人民，也描寫古都故宮的古典景致、亭臺樓閣。這整部小說雖然生動地描摹了清末中國人在列強入侵下所歷經的民族生存挑戰與磨難，然而其間亦有不少描寫異國景色、風俗等使西方讀者不忍釋卷的篇幅，因此，現今的文學評論者錢林森分析此部小說時，雖指出這部小說誕生在中西交流之始的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固然有其複雜的脈絡，但他仍說：「綠蒂寫中國，出於對東方文明的好尚和迷戀，但對中國並不瞭解，……。綠蒂在橫遭西方列強蹂躪的中國廢墟上獵取異國情調，頌揚東方文明，創立親善氣氛，實際上是美化自我，炫耀西方文明，骨子裡表現的是歐洲文化優人一等的思想和感情。」⁵⁴ 若我們延續錢林森的詮釋，同意這部小說體現的果真是西方列強對自我的美化和迷戀，那麼提倡民族主義，以介紹民族文藝為宗旨的《前鋒月刊》，又為何選擇連載這篇「東方主義」小說呢？

研究中國現代認同的學者石靜遠在其著作中談到了失敗（failure）在中國現代國族論述中形成的召喚力量。她從法農（Frantz Fanon，1925-1961）的著作得到靈感，進一步分析對「恥辱」的反省和詠懷，構成了喚醒近現代中國民眾往建立理想國度前進的動力，並以此分析晚清譯者林紓對《湯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之翻譯——《黑奴籲天錄》（1905年），考察譯者如何通過對黑人生存境況的描述，反觀、激勵自我，傳達中國當自強的執念。⁵⁵ 借助此一觀

⁵³ 此書中譯，徐霞村在1928年便曾完成，據他表示，是根據巴黎 Levy Frères 書店出版的第17版原文和 Esor 的英譯本共同譯出，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於1929年3月初版。

⁵⁴ 錢林森：〈皮埃爾·綠蒂和他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華讀書報》第19版，2007年5月9日。

⁵⁵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點來考察皮耶洛蒂的《北京的末日》出現在《前鋒月刊》的意涵，則《前鋒月刊》編者群以「恥辱」、「失敗」——八國聯軍之戰絕對可稱得上是一個巨大的失敗——來提醒或試圖誘發讀者（民眾）的同情共感，以建立新的國族文化之心態亦昭然若揭。事實上，此策略還可見於乃至於《前鋒月刊》卷首那些主題多為被壓迫民族受難場景之畫作，編者試圖通過使讀者凝視受難、抵抗挫敗的異國戰場，以激起讀者的義憤，並召喚奮起的意圖亦很明顯。

在此基礎上，本文還想提出另一個詮釋可能，即這些作品在《前鋒月刊》的出現，更涉及了一個「觀看」的角度，反映出了一個有趣的「多重凝視」（multiple gaze）或「想像的凝視」（an imagined gaze）現象，⁵⁶亦即洛蒂以帶有異國情調色彩的眼光凝視、書寫的他者——中國，多年後反過來通過翻譯——而且是特定群體，帶有特定目的的翻譯——重新詮釋、凝視了洛蒂及其書寫。而在這個翻譯的過程中，《北京的末日》更激化了中國讀者的民族情感，通過想像別人如何想像我，重塑了本地民族的認同，甚至成為中國譯者以之喚醒民眾民族意識的利器。由是，《前鋒月刊》刊登洛蒂此篇作品，向我們展現出了東方主義或殖民論述中層層的複雜向度，暗示了我們在所謂的殖民／被殖民、統治／抵抗間，恐怕還存在著許多層值得細密推敲的空間，包括自我與他者如何通過凝視彼此互相定義，以及兩種文化主體在一歷史格局下拉扯、對抗間所呈現的複雜與曖昧，以及主體如何通過感受自己被觀察，而發展出理想的自我，而這也是下文通過對黃震遐刊登在《前鋒月刊》上充滿「異國情調」的詩歌作品之分析，將進一步論述的。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6-65.

⁵⁶ 同注11。

五、《前鋒月刊》中的國族想像：以黃震遐作品爲中心

除了外國文藝作品的翻譯外，文學創作也是《前鋒月刊》的重點內容。在《前鋒月刊》刊載的作家作品中，黃震遐是最爲知名的，也是刊登率最高的，而黃震遐也因其作品被認爲最體現了民族文藝的創作理念，咸被認爲是民族文藝運動的代表作家。⁵⁷ 黃震遐的作品多描寫遠方異域，帶有異國色彩，其融民族情懷與異國想像於一爐的作品，最終成爲民族文藝運動陣營最具代表性的創作。描寫民族，卻書寫異國，此說聽來不無弔詭，然也就是其矛盾處頗值得吾人進一步分析。

黃震遐，廣東人，其一生經歷可見於黃震遐過世後，其夫人、親友所做的回憶文字。據其親友回憶，黃震遐實爲官門之後，幼時家境不錯，但少年時期卻跟隨寡母流落上海。爲求謀生，工作外，從學生時代他便開始積極發表作品，以謀稿費。其作品曾登於《真美善》、《雅典》，因而與傅彥長、朱應鵬等人有所往來。1930年，黃震遐加入中央軍校，赴河南與馮玉祥（1882-1948）軍作戰，一度被傳殉職，《前鋒月刊》還因而在第2期上刊登過黃震遐的「遺詩」。黃震遐在軍旅之間持續創作，應朱應鵬等人邀請，刊登在上海的報刊上，即而今我們在《前鋒月刊》上可見的文字。黃震遐踏上文學創作之路的經歷，使我們得以釐清民族文藝運動撰稿隊伍成員的來歷，亦即，一個受新式教育成長的文學青年與軍官，如何從投稿刊物、熟悉編輯，到進一步展開創作生涯。抗戰前後，黃震遐出走武漢、西北，一度遠赴新疆，任職軍旅之餘，還編過幾本刊物。1949年後，黃震遐遷居香港，陸續擔任過《香港時報》主筆、亞洲出版社總編，及《中國評

⁵⁷ 當時的作家如茅盾便曾稱黃震遐是「范朱合組公司」的兩塊牌子（另一塊是萬國安）之一。茅盾：〈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論》主編，還兼有軍事評論家的身分，以東方赫為筆名撰寫評論，文字散見各報刊，直至1974年病逝。⁵⁸

黃震遐的作家身分，在其晚年已漸為人遺忘，其作品也不多，早年的創作以詩為主，風格浪漫，聲調鏗鏘，文友稱道他詩風頗似拜倫。⁵⁹ 而黃震遐較為人所知的創作，包括了描寫自己投身軍旅心情的〈隴海線上〉、長篇詩劇《黃人之血》，以及小說《大上海的毀滅》，前兩者都首先發表於《前鋒月刊》。黃震遐刊載於《前鋒月刊》的作品，還有描寫軍旅生活的〈哨兵的夢〉、〈黃埔路上的微塵〉；描寫歷史題材敘事的詩如〈讀史雜感（三）〉。其中，長篇詩劇《黃人之血》因題材取材自遠古、洋溢著異域情調，抒發民族主義情懷，尤值得關注。

《黃人之血》長三萬多字，幾乎句句押韻。詩劇背景設定在元朝時期，韃靼人哈馬貝、女真人白魯大、漢人宋大西、契丹人羅英是蒙古大軍俄羅斯遠征隊的主將，就在征服計掖甫（基輔）的前夕，大軍遇上了神秘的希臘女子慕尼瑪，慕尼瑪愛上了羅英，但羅英卻傾心於計掖甫郡主華蘭地娜。攻城之時，羅英殺了華蘭地娜的未婚夫，而華蘭地娜則淪入蒙古統帥拔都的行宮，羅英和華蘭地娜兩人也從此相隔兩地，直到兩年後，蒙古軍分崩離析，率軍反叛的羅英欲退回中原，遇上了一心報仇的華蘭地娜，華蘭地娜將羅英引入蒙古軍中，引導兩方自相殘殺，最終全軍覆沒。最後，慕尼瑪殺了華蘭地娜，在羅英的身邊殉情而死。

黃震遐在序中指出，這篇作品的靈感來源最主要有兩種，一是浩華德的《蒙古史》，一是《俄羅斯的浪漫故事》，兩本書都是英文。經我查找，黃所謂的浩華德的《蒙古史》，應為豪渥斯（Sir Henry Hoyle Howorth, 1842-1923）的《蒙古史：從九世紀到十九世紀》

⁵⁸ 黃震遐：《黃人之血》（臺北：天華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⁵⁹ 《前鋒週報》上刊登的黃震遐「紀念詩」，便曾稱呼他為「我們的熱血英雄拜倫」。乙斐：〈紀念黃震遐〉，《前鋒週報》第11期，1930年8月31日。

(*History of the Mongols, from the 9th to the 19th Century*) 一書；《俄羅斯的浪漫故事》爲上海商務代售的英文叢書，原書不詳，然刊登《黃人之血》時旁邊搭配的俄國插圖，料想應也是出自此書。黃震遐的這番創作，涉及了一個上海作家跨文化轉化西洋作品的議題，一個當時的中國譯／作者將西方學者描寫蒙古的著作，及俄羅斯的文學傳說，通過改寫、想像，重新生產，開展出一個描寫中國民族精神、呼應民族文藝論述意識形態作品的歷程。

黃震遐在其詩歌作品中常使用神秘的、浪漫的意象，渲染情感，被認爲受拜倫影響。在這首民族文藝的代表作品中，我們看到作者卻著意刻劃了一個發生在遙遠時空的故事，蒙古大軍穿梭在中亞，主要人物還包含了俄羅斯公主、希臘美女，情節涉及戰爭前夕與多角愛情，的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拜倫那些描寫遙遠的異域東方、勇猛的英雄、精神的流浪的詩歌，如《東方敘事詩》(*The Oriental Tales*)。然黃震遐此作品中的異國情調投射在兩個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是對蒙古大軍在異地驍勇善戰的刻畫，一方面是對西方他者（尤其是她者）的浪漫想像。

首先，黃震遐在其詩歌中歌頌蒙古大軍雄壯勇猛，又驍勇善戰，橫掃歐陸，傳達出勇猛的「大亞細亞」精神，詩中這樣描述：「揮著我大元征服的鐵索，率領五十萬亞細亞的猛虎……成吉思汗在長城上猛擂戰鼓，我要把歐羅巴變成一片沙漠。」除了大亞細亞精神外，黃震遐還在其中藉著歌頌蒙古大軍的勝利，讚揚黃種人的凱旋，詩中這樣說：「一千二百四十二年，全世界刮著黃色之風！……一千二百四十二年，黃族是世界的主人翁。」這些詩句傳達的思想，呼應了長久以來近現代中國思想界對中華民族再創新局的期盼，及黃種人團結一致以行「種戰」的論述。⁶⁰ 事實上，成吉思汗大軍對歐洲

⁶⁰ 比如梁啟超便曾指出：「直當凡我黃種人之界而悉平之，而支那界、日本界、而高麗界、而蒙古界而暹羅界，以迄亞洲諸國之界、太平洋諸島之界，而悉平之，以與白色人種相馳驅於九萬里周徑之戰場，是則二十世

的侵略，其時已有西方人以「黃禍」稱之，繼之至二十世紀初，歐美文壇亦有人以黃禍描述或預言二十世紀亞洲的崛起，包含了前文所提及的傑克倫敦。黃震遐書寫元朝大軍入侵歐洲的歷史事件時，實乃通過歌頌元朝大軍的「壯舉」，傳達對中國即將復興的期盼，他曾為文表示，這些征服者「異常的清潔勇敢和高貴」，稱頌其以「可敬可傲的兇蠻」征服一大半的世界，⁶¹ 其期盼殷切，於是不及回應「黃禍」論述中的種族主義色彩。魯迅便曾批評民族文藝者：「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幹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⁶²

於是黃震遐詩歌中歌頌的民族昂揚之地，終不是棲居於一個和平的、流著奶與蜜的烏托邦，儘管他自稱大亞細亞主義並不是帝國主義，但他的創作中所表達出來的意識形態，卻仍淪入複製西方世界秩序的循環中，無法超越其外，如同倪偉指出，黃震遐的《黃人之血》，雖彰顯了主體「我」翻轉中與西二元建構的想像，但其所認同的仍是由白人建構的秩序，一個優勝劣敗、通過殺戮建立的世界。⁶³ 儘管，黃震遐自己在此詩劇的序文中說，這個故事旨不在歌頌黃種人

紀之所當有事也。」梁啟超：《飲冰室合集》第1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飲冰室文集」之1，頁83。

⁶¹ 黃震遐：〈我是一個韃靼〉，《申報》藝術界副刊，1928年8月14日。

⁶² 1934年11月21日，魯迅為英文刊物《現代中國》完成一篇文章，名叫《中國文壇上的鬼魅》，談到民族文藝，魯迅指出：「他們知道，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幹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佔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收於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54。

⁶³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頁204。

屠殺白種人的行爲，而是想傳達「友誼與團結的力量」，並表現中世紀的三種思想——希臘思想、希伯來思想、游牧思想——的競爭，及對三大思想沒有融合的失望。⁶⁴ 然而閱畢這篇詩作，讀者對黃震遐所謂的「三大思想」的競爭所指為何，所得面目恐怕仍然模糊。

實際上，早在晚清小說中，我們已經可讀到一些描述未來、黃種人統領世界的作品，如《電世界》和《新紀元》；此外，在黃遵憲的〈旋軍歌〉、梁啟超的《班定遠平西域》等詩歌、戲劇作品中，也可見到歌頌黃種人勝利的文字。在這些作品中，作者通過描述黃種人和西方人大戰，最後由黃種人勝出、統治世界的情節設置，以及小說人物的命名（如《新紀元》的主人公名叫「黃之盛」），傳達黃種人（其實即是中國人）即將翻轉世界秩序，成為世界霸主的想像，寄託著時人對中華帝國未來烏托邦理想。⁶⁵ 在黃、梁兩人的作品中，也可以見到與上述作品相似的，一種歌頌從軍之樂的尚武精神。黃震遐的作品雖距以上作品已數十年之久，但其作與上述兩者基本主題的近似，無疑提示著我們，此類歌詠種戰、從軍主題的作品，在晚清中國面臨危急存亡時期之際已見端倪，直至二、三〇年代，隨著建立民族國家的訴求在對日戰爭之夕更日益受到重視，不絕如縷地歌頌著種戰必勝、國族再興的願望，實非歷史的偶然。

而黃震遐在序中還提到希望能通過這首詩傳達「友誼和團結的力量」，通過對漢族羅英不能團結，率軍回歸中原，導致蒙古大軍分崩離析此一情節設置，以及作者歌詠時的不無遺憾，我們的確可以感受到此詩劇傳達出一種期待中華各族平等攜手，共立大業的想像。而其時蒙古族對漢人的統治，在此詩劇中似乎被改寫成一個召喚「五族共和」的版本，而此與其時民族文藝陣營（以及國民黨陣營）提出的民

⁶⁴ 黃震遐：〈寫在黃人之血前面〉，《前鋒月刊》第7期（1931年4月），頁1-4。

⁶⁵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93.

族論述主旋律——民族統一、建立一個統一的現代國家——是相呼應的，也回應了民族文藝運動者在其宣言中所描述的一個「民族是一種人種的集團」之定義。亦即，黃震遐此作品中的蒙古族與漢人不存在著其心必異的種族衝突，而是因同為黃種人，遂分享著黃種人大敗西方白族的光榮勝利，這不禁使人想起，此詩歌中寄託的民族想像，不即是宣言中所說的：「過去的共同奮鬥，是民族形成的唯一的先決條件；繼續的共同奮鬥，是民族生存進化的唯一個先決條件。」體現了當時國民黨文化陣營對國族未來所寄託之心理願望。

黃震遐在《黃人之血》中對西方她者——一位是希臘美人，一位是俄國公主——的美麗外表與熱烈愛情的刻畫，亦是此詩劇的重點，也是前文所述的第二層異國想像。黃震遐在詩中對兩位異國她者外表的描述之處頗多，如：「怎麼，黑暗中突然來了兩朵紅嘴，一雙火眼，合攏滑膩的手臂，亂髮雲般蓬散，妖香四飛，熱顫的肉胸賽過熟透的雞頭。」「華蘭地娜郡主哟，正在做著神秘的春夢。透明的輕紗帳裡，湖色的被中，玉體橫陳，露出豐膩的酥胸，多情的櫻唇微笑，潤濕而嫣紅。」⁶⁶等等不一而足。在以往談後殖民主義的論述中，已有研究者談到帝國之眼與女體凝視的關係，以及這樣的現象在文學作品中如何呈現，展現出殖民者對被殖民者的征服慾望。⁶⁷然而，從以上文字，我們可以發現，通過黃震遐的敘述，本地讀者的眼光被作者帶領，反過來凝視著異國，而西方的異國「她者」，於是成為被慾望的客體，東方他者此時轉換身分成為了觀看的主體，由是翻轉了拜倫詩歌中觀看、想像東方他者的西方殖民者眼光（colonial gaze）。⁶⁸不

⁶⁶ 黃震遐：《黃人之血》，《前鋒月刊》第7期（1931年4月），頁35。

⁶⁷ Julia V. Douthwaite, *Exotic Woman, Literary Heroines and Culture Strategies in Ancient Régime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⁶⁸ 殖民凝視（colonial gaze）通常指的是殖民者如何看待殖民地文化，尤其在攝影發達的十九、二十世紀，被殖民者如何被呈現、觀看，成為後殖民學者談論的重點。請見 Mary Louise Pratt,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而近來亦有學者指出，殖民

過，此一凝視、觀看「她者」以建立自我之歷程，固然可能翻轉了二元對立的中西權力位階，然而在這個容納異國的世界想像中所建構出的主體，卻是以在「他的」歷史（His story）中噤聲的「她聲」為代價建構出來的，由是，其所建立的，恐怕也只能是一個單一、威權的主體。

黃震遐在《前鋒月刊》上刊登的其他詩歌作品，還包括了與《黃人之血》主題相近的詩歌《讀史雜感》（第2期），這組詩中包含了三首短詩：〈BEDOUIN 騎士的自誇〉、〈赤衣軍的航行〉、〈蘇魯的兵〉，都與戰爭的壯烈、軍士的雄壯等主題息息相關，亦飽含了異國情調。其中以〈蘇魯的兵〉一詩最長，詩中刻劃戰爭的殘酷：

他們的職業的名稱叫著「戰鬥」
他們的頸間的飾物是敵人的骷髏
他們進行的時候好像一陣黑色的旋風，
狂焰烈火都不能消滅他們的英勇。
一百個荷蘭侵犯者的鮮血染遍了威甯的原野
一千個蘇格蘭的高原戰士都抵不住他們鏖戰的猛烈
那好望角三萬個白人皆顫抖於遠方的蘇魯凱歌之下
天下無敵的大不列顛破碎的國旗充滿了那依山德臘那的山峽。⁶⁹

從以上摘錄的詩句，我們可以發現，這首詩歌描述的與《黃人之血》情景雷同，只是作者歌頌的勇敢殺戮西方白人、驍勇善戰的英雄，換成是非洲的黑人士兵，整體來說，他所謳歌、嚮往的仍是反抗與征戰。

性本身可能並非單純的壓迫、抵抗等二元模式可以概括，對於個案需要更細膩地梳理，比如阮斐娜對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文學活動的研究。請見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的殖民地文學》（臺北：麥田出版，2010年），頁13。

⁶⁹ 黃震遐：〈蘇魯的兵〉，《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195。

在黃震遐另一篇刊登在《前鋒月刊》上的作品《隴海線上》，其中亦包含了一定程度的異國敘事，尤其體現在對其中七個參與戰爭的白俄士兵的描述中。這七位士兵被黃震遐描述為勇猛、愛國、深沈、友愛的鬥士，他們久經沙場，訓練有素，引導著敘述者我（其名為「黃宗漢」，又是另一個令人聯想起晚清小說主角名的命名）在戰場上勇敢殺敵。如同楊慧的研究指出，白俄士兵在其作品中被黃震遐書寫成無畏的鬥士，忽略了其身為雇傭兵的事實，包括了黃震遐在文中描述自己站哨時懷想自己有如「法國客軍」的場面，⁷⁰將國民軍描述成雇傭兵，瓦解了民族文藝應要歌頌的「光榮國民革命」企圖，是其作品最大的敘述裂隙。⁷¹然本文想進一步指出，黃震遐如此在作品中浪漫化、英雄化這些白俄士兵的形象，並異國化自己參與戰爭的經歷，其實正反映出其獨特的民族主義情懷。如同黃震遐曾表明的，西方人的「民族思想」通過戰爭的淬煉，形塑了對民族的認同，亦即帶來了民族的靈魂，因此他要歌頌戰爭，⁷²或許還包括了異地的戰士。因此，如果說如同學者指出，描寫恥辱、挫敗，在建構中國近現代的民族想像時，發揮了號召讀者同情共感的效果，那麼本文還想指出，黃震遐的作品則進一步證明了，書寫、閱讀異國戰士對抗與奮進的敘事作品，於他亦是召喚中國讀者愛國熱情、激起民眾憤慨、形塑自我認同的有效手段；亦即，異國他者的在場，在現代中國的民族認同建構歷程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

此外，《前鋒月刊》上還刊登了黃震遐描述其行伍生活的〈哨兵的夢〉，轉述一位站在墳頭放哨的小兵洶湧的夢想：

⁷⁰ 「每天晚上站在那閃爍的群星之下，手裡執著馬鞭，耳中聽著蟲鳴，四周飛動著無數的蚊子，樣樣都使人想到法國『客軍』在非洲沙漠裡與阿拉伯人爭鬥流血的生活。」黃震遐：《隴海線上》，《前鋒月刊》第5期（1931年2月），頁69。黃震遐將自己比作法國「客軍」（即「傭兵」）的說法一出，曾引發魯迅、瞿秋白等文人一陣批評。

⁷¹ 楊慧：〈「英雄」的傳奇——黃震遐《隴海線上》的白俄敘事〉，《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4年第1期，頁203。

⁷² 黃震遐：〈戰爭的靈魂〉，《申報》藝術界副刊，1928年8月22日。

突然，一陣馬號向天狂吹
淒厲，雄猛，將宇宙打碎。
鐵蹄踏出光明的火焰，
沿著白沙大路，一隊又是一隊。

……

於是他才瞭解什麼叫犧牲，
為民族而戰的男兒又何止他一人；
南天的紅光漸漸幻滅了—
他舉槍—「立正！」⁷³

在《〈隴海線上〉序詩》中，他則再次強調的投入戰爭的雄心壯志：

可是朋友們—
你可聞見號筒的雄音？
你可聞見戰馬的悲鳴？
在朔風凜冽的天然裡，
你可聽見前進的步伐聲？
嗚呼，先驅者啊，先驅者的心！⁷⁴

由此，我們終於可以總結，通過描繪血腥的沙場與奮戰的各種族，黃震遐的異國情調書寫試圖召喚的，不就是上述兩首詩所說的「犧牲」與「前進」的「為民族而戰」之雄心，以企圖完成民族文藝論述一開始的在宣言中宣示的理想——建立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解放、強大的民族國家，及追求世界各弱小民族的解放？而查其內容，其所更偏重的無疑是前者。從此來看，儘管黃震遐在民族文藝刊物《前鋒月刊》上登載的作品沒有刻意醜化敵軍，或者完全體現民族文

⁷³ 黃震遐：〈哨兵的夢〉，《前鋒月刊》第7期（1931年4月），頁碼不清。

⁷⁴ 黃震遐：《〈隴海線上〉序詩》，《前鋒月刊》第5期（1931年2月），頁1。

藝陣營的創作方針，但其作品還是為民族文藝奠立下了一座創作實績的石碑。

黃震遐完成這些作品時只有二十來歲，他曾經是一個熱愛都會生活、上海租界中的異國情調，喜歡浪漫主義文學的青年；⁷⁵ 投筆從軍後，他仍不忘書寫，從他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其所體現的民族思想或民族精神，傾向於一種浪漫化的英雄歷險，某種程度上還有對不惡野人，因其必有「新力」的渴慕。⁷⁶ 除了其個人思想背景、視野之影響，黃震遐作品對《蒙古史》、俄羅斯浪漫傳說的改寫，還受到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出版、發行此刊物的贊助人（范爭波、朱應鵬及其背後的文藝陣營）之影響，更回應了當時的文學環境，從而在形塑國族認同、國家想像上，發揮其功能。這類作品不受到文學批評者的好評，或其來有自；然而如上文所述，晚清以來，想像黃人終將征服世界的文學比喻實由來之久，而本文通過對黃震遐此類作品中折射的國族意涵之分析更想進一步指出，其作品巧妙地回應了晚近學者對中國民族主義的觀察：「中國民族主義是對外來壓力的一種反應」，⁷⁷ 由此，其論述於是並不汲汲於釐清民族的實質內容，甚至忽略了對建設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所需的制度與基本精神的關注——那就是對平等、人權、個體的差異性之尊重，而這無疑是研究《前鋒月刊》及其國族

⁷⁵ 年輕時期在上海度過的黃震遐，和當時流連咖啡館，以享受都會生活，追慕法國文化的一群年輕作家張若谷、傅彥長、邵洵美、徐蔚南等人頗有來往，他曾描述這群文人聚集在一塊談文論藝的場面，頗似巴黎氣息來到上海。魯迅曾經敏銳地指出民族文藝作家本來沒有意義地認識自身的潰敗，「於是就自欺欺人的用種種美名來掩飾，曰高逸，曰放達（用新式的話來說就是頹廢），畫的是裸女，靜物，死，寫的是花月，聖地，失眠，酒，女人。」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⁷⁶ 「尼把（Fr. Nietzsche）不惡野人，謂中有新力，言亦確鑿不可移。」請見魯迅：《墳 摩羅詩力說》，《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64。

⁷⁷ 鄭永年：〈中國民族主義和自由主義〉，《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頁30。

想像對當今的我們仍具有的最具啟發性的意義。

六、小結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在其研究中已曾談到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在現代中國國共兩種意識形態陣營中並存的現象，並指出二、三〇年代的中國翻譯作品因此也受到影響，其翻譯時常出自一種熱情，卻缺乏對翻譯作品實際的了解。⁷⁸然而，與其談論翻譯家是否完成了完美的翻譯，現今的文化翻譯研究者，則更願意著眼異域文化再現的不一致，其背後所涉及的文化塑造與建構現象。也就是說，異域文化被本地文化人士的再現，重要的是考察其所讀出的、強調詮釋的，究竟是哪些部分？而這些部分又是應和了什麼本地價值或需要？此一變化誕生在什麼樣的脈絡與情境之中。而就在這個不被譯出的，沒有被選擇呈現的匱乏中，我們也能看見中國近現代文化脈絡、意識形態與贊助人的想像如何影響了譯者的翻譯選擇與策略。

民族與文藝的糾纏，在中國近現代文學場域中一直是一個重要的議題。晚清以來，中國面對陵替國勢，亟欲救亡圖存，民族再興的期待，與現代國家的建立同步而行，自此成為中國近現代文化發展的重要關鍵詞，引領各方面的一連串變奏。在文藝發展層面，從小說革命、五四新文學之爭始，民族統一、建立現代國家的國族想像成為文學創作中難以迴避的主題，甚至成為引領變革的動力；而進入二〇年代，左右翼陣營發展出各自的文藝政策後，國民黨的「前鋒社」在上海倡導「民族文藝運動」，將文藝、民族，和現代國家的建立、發展聯繫起來，以此黨的綱領統領文藝、國策，目標終為建立並鞏固、統治此一獨立、統一的現代中國，更彰顯了其中的難分難捨。

⁷⁸ Joseph R. Levenson,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7-9.

民族與文藝的相互聯繫在近現代中國的發展，體現了安德森的理論，民族概念內涵的想像和建構，可通過書寫、創作的流傳來完成。然本文還進一步指出，此概念的形塑，還可以通過對異域文化、文本的再現、翻譯與改編，經過報刊媒體的流布而傳遞。本文縮結上述的文化翻譯理論，分析民族文藝運動主要參與者「前鋒社」編輯的《前鋒月刊》上所刊登的異國文藝翻譯、異國文化評介，與異國情調書寫（黃震遐的民族文藝創作）之內在意涵，探討其異國文藝譯介所選擇呈現的與所遮蔽的，如何反映了上述的外部環境、贊助人的意識形態與文學場域，更論證其中所暴露的民族文藝運動者的國族文化想像，評述其特色與限制。本文指出，《前鋒月刊》上所刊登的異國文藝翻譯，彰顯了編輯群欲以描述中國面臨民族存亡時刻、各民族追求解放、獨立等作品來召喚、凝聚民眾對未來中國的理想。其異國文藝評介，著重文壇消息引介，以歐美各地著名作家以及描寫民族精神的作品介紹為主，體現了編輯群對加入世界強國之林的渴慕，以及以其他弱小民族堅強奮鬥的身影召喚讀者對現代中國終將復興此願望之凝聚。由此，在他們的譯介評述中，各國主要的文學現況或者發展可以不必清晰精準，但重要的是必須和民族主義精神相關，或者必須將其興盛歸功於該地民族主義精神的強大，以呼應編輯團隊與其贊助人的意識形態。而黃震遐這位民族文藝陣營的代表作家在《前鋒月刊》上發表的眾多帶有明顯異國情調，甚或轉化來自西方文學之靈感的作品，更是在情節安排、人物描寫與主題設置的選擇上，反映了民族文藝運動者的終極關懷——建立一獨立、強大、躋身世界的現代中國此一國族想像。即便此邏輯複製了西方世界優勝劣敗的世界觀，忽略了此建構中對異質性與多元性存有的平等與尊重——而這或許恰是建構一個永續發展的現代國家最重要的精神。

中國百年來的發展，在風雨飄搖間尋覓乘風破浪於新世界的道路，啟程之前，其中首重掌舵者的自我定位，接著方能在舉步維艱中既回應衝擊，又縮結舊有，開創新局。航向未知的二十一世紀，以及

無數下個世紀，識者不禁要問，前方等待著是否是一個不存在的「將來的黃金世界」？而此次旅程與百年前相比，其想像與召喚的力量與憑據是否依然？那麼，繼續前進之航程其意義又何在？其寄望或可能將大不相同？由上觀之，梳理《前鋒月刊》以及論析其上的異國文藝譯介與國族想像，或可略作為以上關懷之補述，無疑此其時也。

表一：《前鋒月刊》中刊登的異國譯介一覽表

國家／民族	文藝或現況譯介	翻譯作品	插圖	總數
德國	6	2	3	11
俄羅斯	1	0	7	8
印度	3	0	4	7
希臘	2	0	1	3
法國	7	3	2	12
西班牙	1	0	1	3
愛爾蘭	5	0	0	5
日本	3	1	0	4
丹麥	1	0	0	1
蘇格蘭	2	0	0	2
美國	6	5	0	11
美國（非裔）	3	0	0	3
猶太	1	1	0	2
越南	1	0	0	1
波蘭	2	0	0	2
荷蘭	3	0	0	3
南美	1	0	0	1
英國	8	0	0	8
紐西蘭	1	0	0	1
瑞典	1	0	0	1
澳洲	1	0	0	1
挪威	3	0	0	3
芬蘭	2	0	0	2
義大利	4	0	0	4
比利時	2	0	0	2
奧地利	2	0	0	2
羅馬尼亞	1	0	0	1
瑞士	1	0	0	1
保加利亞	1	1	0	2

亞美尼亞	0	1	0	1
土耳其	2	0	0	2
曼島	1	0	0	1
冰島	1	0	0	1
加拿大	1	0	0	1
丹麥	1	0	0	1
匈牙利	2	0	0	2
立陶宛	2	0	0	2
捷克	2	0	0	2
塞爾維亞	1	0	0	1
愛沙尼亞	1	0	0	1
拉脫維亞	1	0	0	1
刊物中出現的國家／地區／民族數目	41			
備註：本表格製作以刊物中有獨立成篇或段的譯介文章為計，不包含各國零散出現於文中之次數。				

徵引書目

- [日] 小森陽一著，熊文莉譯：〈「文學」和民族主義〉，收於賀照田編：《東亞現代性的曲折和展開》，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333-341。
- [美] 班納迪克·安德森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新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
- [俄] 羅季奧諾夫：〈1930-1931年中國民族主義期刊上的俄羅斯和俄羅斯文學——以《前鋒週報》和《前鋒月刊》為例〉，《社會科學戰線》2013年第5期，頁114-118。
- 乙斐：〈紀念黃震遐〉，《前鋒週報》第11期，1930年8月31日。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5輯第1編「文化」（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年。
- 方曉虹：《中國新聞史》，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王爾敏：《中國近代思想史論》，臺北：華世出版社，1977年。
- 王斑：《歷史的崇高形象——二十世紀中國的美學與政治》，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 王文仁：《啟蒙與迷魅：近現代視野下的中國文學進化史觀》，臺北：博揚出版社，2011年。
- 朱應鵬：〈中國的繪畫與民族主義〉，《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50。
- 朱曉進：〈從《前鋒月刊》看前期民族主義運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7年第1期，頁290-292。
- 李金髮著，陳厚誠編：《李金髮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8年。
- 李國祁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 余英時：〈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激進與保守〉，收於余英時：《錢穆與中國文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
- 阮斐娜：《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臺灣及南方的殖民地文學》，臺北：麥田出版，2010年。
-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3期，2002年12月，頁49-120。
- 金觀濤、劉青峰：〈從「天下」、「萬國」到「世界」——兼談中國民族主義的起源〉，收於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頁226-251。
- 周雲鵬：《民族主義文學（1930-1937年）論》，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
- 茅盾：〈民族主義文藝的現形〉，《文學導報》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 張大明：《國民黨文藝思潮——三民主義文藝與民族主義文藝》，臺北：秀威資訊科技出版社，2009年。
- 孫中山：〈三民主義〉，收於孫中山著，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編：《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85-186。
- 倪偉：《民族想像與國家統制：1928-1949年國民黨的文藝政策及文學運動》，臺北：人間出版社，2011年。
- 虛白：〈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的檢討〉《真美善》第7卷第1期，1930年11月，頁1-9。
-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張靜廬：《在出版界二十年》，上海：上海雜誌公司，1938年；上海：上海書店再版，1984年。
- 陳抱一：〈日本洋畫發展的概況〉，《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26。

- 黃震遐：〈我是一個韃靼〉，《申報》藝術界副刊，1928年8月14日。
- 黃震遐：〈戰爭的靈魂〉，《申報》藝術界副刊，1928年8月22日。
- 黃震遐：〈積極的藝術思想〉，《申報》藝術界副刊，1929年8月31日。
- 黃震遐：〈蘇魯的兵〉，《前鋒月刊》第2期，1930年11月，頁195。
- 黃震遐：〈《隴海線上》序詩〉，《前鋒月刊》第5期，1931年2月，頁1。
- 黃震遐：《隴海線上》，《前鋒月刊》第5期，1931年2月。
- 黃震遐：〈哨兵的夢〉，《前鋒月刊》第7期，1931年4月，頁碼不清。
- 黃震遐：〈寫在黃人之血前面〉，《前鋒月刊》第7期，1931年4月，頁1-4。
- 黃震遐：《黃人之血》，臺北：天華出版事業公司，1979年。
- 黃興濤、王峰：〈民國時期「中華民族復興」觀念之歷史考察〉，《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頁129-137。
- 黃興濤：〈清末現代「民族」觀念小考〉，《人文雜誌》2011年第4期，頁140-144。
- 黃興濤：《文化史的追尋：以近世中國為視域》，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黃金麟：〈醜怪的裝扮：新生活運動的政略分析〉，《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30期，1988年6月，頁163-203。
- 魯迅：〈「民族主義文學」的任務和運命〉，《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1931年10月23日。
- 魯迅：《墳 摩羅詩力說》，收於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66。
- 魯迅：《且介亭雜文·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收於魯迅著，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頁154。
- 楊慧：〈「英雄」的傳奇——黃震遐《隴海線上》的白俄敘事〉，《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2014年第1期，頁196-209。
- 潘公展：〈從三民主義的立場觀察民族主義的文藝運動〉，《中央日報》

大道副刊，1930年6月26日。

劉紀蕙：〈現代化與國家形式：中國進步刊物插圖的視覺矛盾與文化系統翻譯的問題〉，收於黃克武主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359-393。

鄭永年：《中國模式：經驗與困局》，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

錢振綱：〈民族主義文藝運動社團與報刊考辨〉，《新文學史料》2003年第2期，頁189-200。

錢林森：〈皮埃爾·綠蒂和他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華讀書報》第19版，2007年5月9日。

羅志田：《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年。

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羅志田：〈中國文藝復興之夢：從清季的「古學復興」到民國的「新潮」〉，《漢學研究》第20卷第1期，2002年6月，頁277-307。

Bell, Morag., Butlin, Robin Alan., and Heffernan, Michael J. *Geography and Imperialism 1820-1940*.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Billing, Michel. *Banal National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6.

Clifford, Nicholas Rowland. *Shanghai, 1925: Urban Nationalism and the Defense of Foreign Privilege*. Ann Arbo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9.

Douthwaite, Julia V. *Exotic Woman, Literary Heroines and Culture Strategies in Ancient Régime France*.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2.

Headrick, Daniel R. *The Tools of Empire: Technology and European*

- Imperiali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1981.
- Jing Tsu,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acan, Jacques, "The Split between the Eye and the Gaze." In *The Four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Psychoanalysis*. 67-78.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Norton, 1978.
- Levenson, Joseph R.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t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 Pyros, John. *Mike Gold: Dean of American Proletarian Literature*. New York: Dramatika, 1979.
-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 Rodionov, Alexey. "Internationalism and Nationalism of the Chinese Right-wing Periodicals 'Qianfeng yuekan' and 'Qianfeng zhoubao,'" In EACS Biennial Conference (2010.09). 作者未出版會議論文稿。
- Sarup, Madan. *Jacques Laca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2.
- Spence, Philip. Wollman, Howard. "Blood and Sacrifice: Politics Versus Cultur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ism." In Kevin Joseph Brehony and Naz Rassool, (eds.) *Nationalisms Old and New*. 103-106. Basingstoke : Macmillan Press, 1989.
- Sontag, Susan. "Fascinating Fascism." (1974) In *A Susan Sontag Reader*. 305-325.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82.
- Shih, Shumei. *The Lure of the Modern: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Venuti, Lawrence. "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Schaffner, C. and H. Kelly-Holmes (eds.) *Cultural Functions of
Translation*. 9-25. Clevedon: Multilingual Matters, 1995.